



语言符号学丛书

符号·语言·人

SIGN LANGUAGE HUMAN

吕红周 著

——语言符号学引论

南开大学出版社

语言符号学丛书

符号·语言·人
——语言符号学引论

吕红周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语言·人：语言符号学引论 / 吕红周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10
(语言符号学丛书)
ISBN 978-7-310-05235-6

I. ①符… II. ①吕… III. ①符号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6385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立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6.875 印张 2 插页 238 千字

定价：4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天津外国语大学“十二五”科研规划

2015年度重点项目

“语言符号学：理论、方法与应用”（15ZD03）

总序

语言是特殊符号系统，也是符号最重要的体现形式。语言作为符号成为研究的正式对象始于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其学说被美国、法国、俄罗斯、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者继承和发展。时至今日，语言符号学已成为符号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

语言符号学立足于语言学与符号学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关系，侧重于用符号学的理论思想和方法论工具来分析和解决语言学问题。语言符号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研究，但同时这些理论研究在应用层面也显示出其价值所在。而且，语言符号学以语言符号为研究中心的同时，其研究范围也向外围延伸，涉及语言符号的意义生成与理解的诸多问题和领域。中国的语言符号学研究始于 20 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在世纪之交，伴随着《语言符号学》《符号学研究》《现代语言符号学》等著述的出版，中国学人的探索受到海内外符号学界的关注。目前，国内语言符号学的研究成果已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语言符号学丛书”正是这一态势的体现。被列入该系列出版的专著和主题文集，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将围绕语言符号展开，探索语言符号及其意义生成与理解的奥秘。我们期待着这套丛书能够丰富我国的符号学研究，也为世界的符号学研究做出贡献。

“语言符号学丛书”由天津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组织编辑，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的出版得到天津外国语大学科研出版基金的支持。

这是一个开放的学术传播平台，欢迎更多的语言符号学研究成果进入这一丛书系列！

“语言符号学丛书”总主编

王铭玉

2016年9月28日

序 一

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语言符号学》一书，在其前言中我写道：“语言符号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其创立需要‘志同道合之士’的共同努力。”2007年，吕红周报考了我的博士，当时我告诉他从事符号学研究将会是一个艰辛、痛苦的过程，同时也是选择了一个有前景和发展的领域。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符号学在我国学科地位尚不稳固，符号学的本体论缺失和边界的不甚明晰给自身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批评；另一方面，世界符号学的蓬勃发展和诸多符号学交叉学科的出现，给这门学科注入了强盛之血液。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浩瀚的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随着国家的强大和文化的复兴与进步，我国必将成为世界符号学新的中心。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吕红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要成为符号学研究领域的“志同道合之士”。我对博士生的指导原则是：学生应该有而且必须有自己的想法、观点和立场，自己选择博士论文的题目；养成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能从大量文献阅读中发现问题，运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最好是能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分析某一个问题，因为跨学科和超学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读博期间，他选择了用符号学理论分析隐喻这一课题。他每写完一章就送给我提修改意见，然后再回去找资料进一步分析和论证。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吕红周表现出的顽强刻苦、坚持不懈、勇于探索的精神为他日后开展符号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的博士论文部分内容经过修改，成为《现代语言符号学》（商务印书馆，2013）的第五编“隐喻符号学研究”，这是运用符号学理论分析隐喻现象、解释隐喻生成和解读的一次尝试。

《符号·语言·人——语言符号学引论》是吕红周在符号学征途上的第一本专著，是围绕着符号、语言、人这三个核心要素关系展开的研究成果。本书虽以“语言符号学引论”定位，但通读书稿后我们发

现，其内容的丰富和分析的深度无不反映出作者对语言符号学这门学科所做的思考。

作者在上编中介绍了符号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厘清了符号学的学科概念，从术语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符号、符号学、语言符号学等概念，澄清了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历史，为引入语言符号学做了铺垫。作者选取了语言符号学、社会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生物符号学、翻译符号学、生态符号学六门符号学交叉学科加以梳理，让我们对符号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一般方法论有了较好理解。当然，符号学的交叉学科还有很多，我在第五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闭幕式的总结发言中提到，至少有 15 门以上的符号学交叉学科。翻译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是目前国内的新方向，体现出作者灵敏的学术嗅觉和对前沿问题的关注。作者选取了索绪尔、洛特曼、斯捷潘诺夫、韦特罗夫、巴特、特鲁普六位符号学家，其中不乏俄罗斯符号学者，意在补充以往研究中被学界关注较少的俄罗斯符号学研究学者情况。特鲁普虽然是爱沙尼亚学者，但他是莫斯科—塔图符号学派的重要代表，尤其是他关于翻译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翻译的思想成为当前新塔图学派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建构翻译符号学的有益参考。上编中的另一工作是对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发展历史、我国符号学学术刊物、学术研究机构介绍，这一情况也是我国符号学研究历史的反映。

下编从人与符号、语言与符号、人与语言、语言符号学的应用研究几个论题，从人是符号的动物发展为人是符号的主体，语言作为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发展为社会化的符号系统，从符号与神话的关系到符号与语言的起源等问题的论述，较为全面地展现了符号、语言、人的复杂关系，意在呈现符号和语言是如何在人类社会中发挥作用，人对语言的认识是如何从语言的符号性到语言符号学这门独立学科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作者在进行理论阐释之后，从实践层面进行了语言符号学的应用探索，即语言符号的功能和符号学对隐喻的解读。从全书内容来看，这是作者对符号学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其博士学习阶段的继续和发展。

总的来说，作者在全书中贯彻了语言是全部符号事实中的特殊系统这一核心理念，遵循了语言符号学是用符号学的思想和观点研究语言学问题的宗旨，体现了分析问题的跨学科和超学科视野，这有利于对复杂问题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也是符号学学科属性的根本诉求。其中关于翻译符号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的分析，较好地把握了目前我国符号学研究的新方向。我们希望作者能在符号学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为我国符号学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目前学界有关符号学的书不少，但大多艰涩难懂，红周试想为初学者写一本通俗易懂的入门引论，他做到了；虽有蹉跎，但醒悟后发出誓言，一定不放弃所学，一定不辜负老师期望，他做到了；励精图治、刻苦钻研，争取在儿子懂事之前给其一个学术献礼，他也做到了。作为导师，我对红周还有很多希冀，相信他还能做到更多、更多。

王铭玉

2015年8月3日

序 二

独上文学路 上下求索 终有所成

一、缘起

帝师静安于《人间词话》有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第一境界说的是明确自己的问学目标与方向；第二境界说的是自己为了问学志向，上下求索，不为内外因素所扰；第三境界说的是历尽千难万苦，终有所成。

吕红周博士乃黑大师门王师兄之高徒，多年前立志问学语言符号学于师兄门下，历经七载有余，今终有所成，写就《符号·语言·人——语言符号学引论》一书，请我这小才之人写作序言一篇。为之约请，我颇为忐忑，觉得第一部学术专著，起点高点好，应请前辈作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符号学非我专攻之术。

自1998年修习黑龙江大学连甫教授的《你身边的符号：符号学入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而后兴趣渐浓，重读该著数遍；2002年回黑龙江大学读研究生，再次回到连甫教授的符号学课堂，但内容鲜有新意，故捧读蒋晓华基于博士论文的专著——《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一探符号学与翻译研究联姻之秘，受李锡胤、连甫二位教授鼓励，以符号学理论为基础，研究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写作学

位论文《从符号学语义观看文化翻译之文学语言》^①（黑龙江大学，2005）；之后，我虽依然关注符号学的发展，但没有投入过多精力继续研习符号学，期间仅于2007年发表一篇基于硕士论文的小文——《从符号学视角看歇后语的汉译英》（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1期）；红周博士论文答辩后，虽然跟业师李锡胤教授索要过红周论文，不巧业师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未果；于2013年，偶遇王师兄，他劝我重拾符号学，考虑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问题，才有了2014年第十一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上宣读的《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一文，提出重起炉灶，以翻译过程及其相关现象和行为为研究对象，建构以翻译为对象的符号学分支学科。

之后，觉得既然我已初读著作，不做出点贡献有违“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故而勉强写作序言一篇，浅谈我的学习经历与相关思考。

二、学习所得与亮点

打开信封，乍看到书名之际，我觉得书名“符号·语言·人”具有“强烈”的互文性信息。前苏联学者潘诺夫（Панов，Е. Н.）写作《信号·符号·语言》（王仲宣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李先焜写作《语言、符号与逻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王永祥写作《语言·符号·对话——求索真理之旅》（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胡壮麟出版《语言·符号·教育——胡壮麟教授新世纪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5）等，与之具有明显的信息和意象关联，能即时唤起读者阅读的欲望。

现仅从我学习该书的所得谈及阅读中发现的亮点：第一，学术与学界咨询珠联璧合，作者将中外符号学者相关理论糅合一体，在阐发相关思想的同时，提供了丰富的学界咨询，如研讨活动、学术刊物、

^① 后来发现：该文题目有点拐弯抹角，不如用“从符号学语义视角看文化翻译：以文学文本为例”，或“从符号学语义观看文学语言翻译”，反倒简洁明了一些。

学术成果等，特别是自 1990 年以来的博士论文信息，可为初入符号学殿堂者打开明亮之门，这也是作者的写作初衷；第二，走出象牙塔，将理论应用于现实生活，分析 22 月孩童话语、母亲与儿童对话、有关婚礼的亲子争论等语言符号相关的问题，体现出符号学理论用于分析语言获得、（批评）话语、语用学等相关问题的效用；第三，理论传统与学术前沿紧密结合，作者综述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叶尔姆斯列夫、利科、洛特曼、巴特、斯捷潘诺夫、韦特罗夫等的符号学观点，特别关注雅各布森、格雷、特鲁普等人针对翻译现象的理论阐发，率先在一部引论中阐发与论述语言符号学、社会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生物符号学和翻译符号学相关问题与思想，不但可为初入符号学之门者提供宝贵的参考信息，更可为符号学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启示。

此外，该书系目前首部系统论及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符号学认识论与符号阐释关系的著作，详细地阐述了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相互转换、文字符号转换为视觉、听觉多维合成的“文本”现象，不但凸显了该书的亮点，也暗示了该书在推动中国符号学发展方面的作用。

三、史实思想与中外联系

作者虽然数次提及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符号使用与研发的史实，却没有加以专门的梳理和探讨，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现借写作序言这一宝贵机会，略作纲领式勾勒，以便弥补该书的“挂一漏万”之弊。

（一）名实论辩与语言规划政策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陈满华教授于 1995 年在《文史知识》第 11 期发表《史书、方言中所见的称谓语越级现象》，述及唐代存在用“兄”“哥”称父，以“姐”“姊”称母的现象，其实这种现象早在周秦时期业已存在，故而孔子才率先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主张，才有了后来尹文子、公孙龙、荀子等围绕着名实的大讨论。之所以如此，全因符号使用混乱会诱使社会秩序混乱，甚至产生无穷的后患，故孔子指出符号使用混乱的社会弊病以及开展“名辨”的必要性：“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虽然在表面上，先秦诸子是在论辩语言规划与社会管理之间的关联，但以名实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出发点，这应该是中国语言符号学及社会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及学科始源。从历史角度讲，若从孔子算起，有关语言符号转用（称谓语越级使用）及语言规划的思想，乃是世界最早且有可能是论述最为系统、论辩时间最长的语言符号学学科思想，这也是中国语言符号学对世界符号学的最大贡献。

（二）符号转换与对比分析传统^①

从宗教史看，早在古希腊就有“七十子”齐聚一处翻译《圣经》之说，这一信息虽然在细节上未必属实，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存在符号转换现象，即翻译。据刘亚猛教授口述（2008年来京参加“先秦语言学思想史研讨会”期间）及其《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古罗马人在参考古希腊传统，学习和教授古希腊语，建构古罗马教育与教学的过程中就出现对比分析行为。可见，对比分析古已有之。

纵观中国语言文化思想史文献，中国的对比分析行为的源头大致有三：语内修辞比对、翻译（佛经与政经）实践和外国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研究实践。在语内阶段，西晋文学家挚虞（？—311）在《文章流别论》中，从修辞角度对赋体进行了比对（袁晖、宗延虎，《汉语修辞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61）；后又有《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约465—约520）在《体性》中，对文章风格给予对立比照，并初步接触风格个性化问题（袁晖、宗延虎，1998：74）；此后，刘知几（661—721）从史学著作角度比对修辞（袁晖、宗延虎，1998：96），但到宋代陈骙才真正地出现了今天意义的对比行为，他在《文则》中，将

^① 有关中国语言符号对比分析的传统信息，参见拙作《一部史书 功在千秋——读〈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俄语语言文学研究》，2009年第3期）及“Contrastive Analysis in China: Today and Yesterday”（*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2012, No.2）。

不同时代的著作加以纵比，将相同时代的著作加以横比，还善于将不同体裁的著作放在一起相比，或把同一著作中的不同段落集中起来对比（袁晖、宗延虎，1998：166）。依循此传统，后来从修辞角度在同语内部比对的行为渐多。

翻译史著述公认的是：佛经传入华夏大致在西汉时期^①，然约于公元二世纪始有译经行为。在汉朝时，译经家就在实践中发觉“胡语”（梵语）与“中土文字”之间的差异，如支谦在《法句经序》中说：“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先厥义，是则为善。”（方梦之，《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405）又有南北朝道安从文体方面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至唐朝玄奘从文法角度提出“五不翻”原则，待到清朝严复在《天演论·序》中，从内容、文体风格角度对照，论述原译文之差异和译文应该达到的效果，继而提出“信、达、雅”说。史实记载的事件无不暗示着翻译行为中的对比分析行为，这些言论无不说明中国翻译活动中存在对比分析实践。

明末以降的来华传教士均从习得汉语角度编写识字材料，过程中必然涉及母语与汉言的比对行为，万济国（Francisco Varo）在《华语官话语法》（1703）中就曾将汉言与母语 Castilian 以及法语进行过比对，甚至比万济国更早的还有利玛窦（Matteo Ricci）和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他们在《西字奇迹》（1605）和《西儒耳目资》（1626）中分别对汉西语音进行了比对。此外，还有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之《汉语语法》（1653）、马若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émare）之《汉语札记》（1728）、雷慕莎（Jean Pierre-Abel Remusat）之《汉文启蒙》（1822）等，后来渐渐上升到了理论研究的层次。在这些著述中，有的直接用汉字与外文并置，有的用汉语拼音与外文并置，还有的用汉字配汉语拼音与外文并置，这些情况无不表明：该期来华传教士在学习和编写字书过程中，出现并使用对比分析方法，这是不容否定的

^① 根据新疆艺术学院石晓明教授介绍，以库车等地的佛教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 240 年左右，新疆就已经出现佛教壁画，若符号转换（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活体符号与静体符号）为广义翻译的依据，早在公元前 240 年左右，中国就已经出现佛经翻译行为。

语言学史实。

纵观前述，不论传统修辞，还是佛经翻译和传教士学习汉文与编写字书，均涉及语言符号的使用和转换问题，故而对比分析也应属于语言符号学研究的必要内容。从对比分析的史实看，中国传统上的语言符号使用，已经涉及同语言内部的换用、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已然是后来雅各布森所说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了。

（三）诗歌语言符号范式发展与互文性

传统的中国诗歌，或曰饱含中国文化传统原汁原味的诗歌，并非唐诗和宋词，而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唐之后的诗歌经由佛经翻译，受到梵语文学范式在格式、韵律层面的影响。若从语言符号互文性角度看，唐之后的诗歌均带有浓重的梵语诗歌在格式和韵律层面的印记。

根据罗选民的博士论文《互文性与翻译》（香港岭南大学，2006），孔孟、老庄、陆机、刘勰等的著述中都存在互文现象，只是术语不同而已。鉴于笔者并非旨在探讨互文性的传统问题，且考究这样的漫长历史颇为费工夫，现仅据宋人之言，借以佐证中国唐之后诗歌中的符号互文性问题。

黄庭坚曾言：“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这是针对唐朝韩愈和杜甫的诗作而言，其中的“无一字无来处”就是指诗歌创作中的语言编织结构，也被克里斯蒂娃称作“马赛克结构”，语言学研究称作的“对话结构”；著有《沧浪诗话》的卢羽曾针对江西诗派言：“且其（杜甫）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这里说的也是诗歌中的互文性问题，可见，唐朝之后的诗作着实出现了洛特曼第二系统所说的艺术语言符号的互文性问题。

之所以这样长篇累牍地赘言前述三方面的语言符号问题，意在说明：若作者能以专题模式梳理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的语言符号观，而不是按照固有的时间顺序或派别脉络处理之，必然会更为精彩，同时也能更好地将中外语言符号学的图像编制出美妙绝伦的画卷。

四、结语：价值与学科定位

如前所述,《符号·语言·人——语言符号学引论》一书的价值自然不必说,仅就社会符号学、生物符号学、翻译符号学等层面而言,特别是有关特鲁普和格雷有关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阐发,该书在引领中国符号学发展之功就不小。

其次,作者不囿于学科界限,能够开放地吸收其他学科可资利用的知识,如批评话语分析、儿童语言获得、大学生语言习得等与语言符号使用和表意之间的联系,以及语言符号使用与无限阐释之间的关系,联合心理学、行为学、生物学等,建构了一幅供不断阐释的新时期中国符号学“山水画卷”。

再次,作者能将中外符号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如认知隐喻、翻译符号学、生物符号学、服饰符号学等融入该著,并从符号学角度加以重新审视与反思,不但体现了学者开放的胸怀,更体现了年轻学者在秉承“学术之道在乎继承”宗旨的基础上,站在前人肩膀上加以创新的学术精神。

有鉴于上述,笔者虽然才疏学浅,但读有所得,故乐之为序。

贾洪伟

2015年6月于京东落魄斋

前 言

一、写作背景

人类关于符号的思想和对于符号的认识具有悠久的历史，被誉为符号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Ἱπποκράτης，公元前 460—公元前 370）是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医生，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圣典，由于他的医学观点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还享有“医学之父”的称号。希波克拉底提出症候学，认为病症与疾病之间存在着联系，病症符号是疾病的表现，这是最早的关于医学符号的论述。之后的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 427—公元前 347）、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 530—公元前 470）、克拉底鲁（Kratylos，生卒年不详）、德谟克利特（Δημόκριτος，约公元前 460—公元前 370 或公元前 356），以及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等都对符号展开过研究，出现了事物与名称关系的讨论，对象、符号、意义的区分，符号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等。罗马时期的符号学研究是在修辞学框架下进行的，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给符号的定义是“使我们想到这个东西加之于感觉而产生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王铭玉，2004：79），是对符号意指关系的深入探讨。经院哲学时期符号学的大事件是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大辩论。近代对符号学做出贡献的有培根（F. Bacon，1561—1626）、洛克（J. Locke，1632—1704）、霍布斯（T. Hobbes，1588—1679）、莱布尼茨（G. W. Leibniz，1646—1716）、康德（I. Kant，1724—1804）等人。早期的符号思想主要依附于哲学、神学、语言学，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是 20 世纪的事情了。符号学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迅速崛起，形成了美国、法国和俄罗斯三大世界符号学研究中心，其交叉学科的地位取决于理论来源的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即语言学、符号学、哲学等人文学科，以及系统论、控制论、逻辑学等自然社会学科。